

论智能时代下人类主体性危机

郝志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为智能化的生活，但同时也导致人的主体性危机。数字智能时代带来阶级属性淡化、网络环境异化和社会否定性力量的消弭三方面的主体性缺失危机，本篇文章将从生产关系形式变化、信息技术中介社会关系和智能拜物教性质三个角度来探析，最后求索如何重建主体性，摆脱数字资本主义对人发展的限制。

关键词：智能时代；算法逻辑；主体性危机

DOI：10.64216/3080-1516.25.10.042

信息技术发展将人类带入智能时代，由信息技术为基础开发的网络、智能应用、算法逻辑与数据等新事物成为了智能社会的基础，是联结现代人生活的主要中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资本合谋的大背景之下，技术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技术进步不仅没有带来人进一步解放，反而将人带入了更深层次的异化之中，人的主体性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空前危机。

1 人类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与危害

1.1 阶级属性淡化——个体身份的抽象表达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身份表达日益抽象化和符号化。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能够脱离现实生产关系中相对固定的身份，通过任意属性构建自我表达，形成一种去物质化的身份认同。部分用户试图借助这种符号化的网络生活，暂时逃避现实世界中因所有制导致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虚拟身份因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智能宗教”，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现实不满的精神寄托。但这些“智能宗教”并不能带来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言：“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些“智能宗教”不仅会冲淡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甚至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养料。

在传统工业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法律保障了基本工资和劳动条件，工人因共同的生产体验和生活状况更容易形成清晰的阶级意识。而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经历再度抽象化，现实中的生产关系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流动且高度符号化的网络身份。人们依据兴趣、价值或标签形成群体，群体认同逐渐掩盖了阶级属

性。网络提供的“符号面具”使个体得以短暂脱离现实处境，沉浸于虚拟共同体所带来的认同中。阶级意识在这种碎片化、情感化的群体对立中被稀释，甚至被同化为众多网络身份之一。其结果不仅是阶级属性的淡化，更是对现实不平等结构的非自觉回避，从而在无形中巩固了现有体制。

1.2 合理化程度加深——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认同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仍占据统治地位，并借助信息技术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数字技术并非中立，而是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主要通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构建认同：

在内容上，算法通过干预信息推送，塑造用户对现实的认知，使数字世界的热搜和流量取代真实体验，成为人们感知的“真实”；在形式上，资产阶级作为“快感代理”，通过算法定义和分配快感，只有符合流量逻辑的内容才被认可，用户的情感与欲望被技术彻底规制，人的生活进一步被技术宰制。这种双重压迫使用户陷入“网络大他者”的支配，即便意识到异化也难以反抗。网络已渗透一切生活领域，甚至批判也无法脱离网络进行。与传统工业社会不同，工人曾通过破坏机器表达反抗，而数字时代个体难以对虚拟系统实施有效抵抗。关闭设备只是导致自我边缘化，无法撼动体制本身，对数字资本主义毫无影响。人成为数字系统中被合理化和束缚的“螺丝钉”，在抽象化过程中彻底丧失反抗路径。

1.3 否定性力量消弭——反资运动的碎片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劳动仍然处于异化状态,虽然能够觉察到生存状况的扭曲,却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反抗。在社会群体身份逐渐取代阶级属性的身份逻辑之下,当前反资本主义运动主要有两种路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但都呈现碎片化与改良主义倾向。前者多局限于经济诉求,缺乏政治高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剥削;后者脱离物质生产关系,难以动摇制度根基,且因群体间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无法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总而言之,当前发生的反资运动难以形成完整的革命环节,无法从根本上破除私有制。因此,这些运动实质上默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仅寻求局部改良,已逐渐丧失真正的否定性和革命性。

韩炳哲断言数字时代是一种“透明社会”,这种社会看似透明,实则不透明。如此社会“消除了陌生者与他者的所有否定性”,其结果则是带来整个社会否定性的丧失。信息技术成为生活的新中介,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加深了资本对人的控制。从技术哲学看,技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载体,资本家通过大数据侵入人的精神和反思层面,使反对运动默认制度存在,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在社会学层面,技术加剧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和碎片化,算法主导的交往秩序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固化社群界限,阻断了他者的出现与社会否定性的生成,最终消解了变革的可能。

2 人类主体性缺失的原因

2.1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转型——数字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发展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多次转型。“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时间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智能时代,新形态的生产关系——以数据和算法为承载的数字生产关系——随之诞生。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增殖的绝对命令仍然统摄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转变为外包经济和零工经济。资本家化身数字平台的掌控者,将劳动者们囚禁于算法逻辑之中不断榨取剩余价值。

在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剥削同样是通过平等假象来掩盖实际生产中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中立开放”的智能应用成为当前平等原

则的代言人,而算法逻辑与数据的所有权差异则隐藏在幕后,造就了资本家与劳动者在智能时代不同的关系地位。数字平台成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纽带,资本家作为智能应用数据和算法的实际掌握者与所有者,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依托智能应用展开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看似获得了更多销售机会,消费者看似生活更加便利,但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仍然是资本剥削人的事实。普通劳动者与消费者在生活各个方面与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也是算法逻辑对人生活统治不断加深的过程。正如应用初次载入时主动弹出的用户须知那样,用户被告知可以进行何种操作,且只能那样做。用户在应用上的一举一动都将完全被算法监管、被数据记录,成为智能应用所有者资本增殖的工具。

2.2 信息技术成为结构人与人关系的中介——虚伪的他者性因素

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从组织化转向弹性生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架构。资本借此摆脱物质束缚,获得高度自主性与灵活性。智能应用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资本通过数据和算法制造虚假的“他者”,结构主体的日常生活,将其引入隐蔽的剥削陷阱。人们的日常活动愈发依赖智能应用,技术虽打破时空限制、提供便利,却也遮蔽了真实。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下智能软件背后数据与算法逻辑的所有权差异,人们在软件中活动的的能力不完全由自己掌控,在智能应用上遭遇的社会他者真实性无法保证。“他者是一种他在性的结构力量,是能指的场域,是主体在此完成其认同的场所,所谓主体是被结构的,实际就是在他者秩序中构成的,主体总是且已然他者的主体,是在他者场域中出现的效果主体。”主体作为他者结构的产物,他者性因素是构成主体活动意义的关键性维度。而资本恰恰利用这一机制,通过培养用户习惯、利用数据与算法霸权,逐步瓦解个体的反思与实践能力,最终将其困于“信息茧房”,沦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被动循环的被剥削对象。

2.3 智能拜物教导致的技术异化——主体意义危机

如前文所述,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主体的生产与生活,非但未能真正赋能于人,反而加剧了人的异化。其根源在于此类技术诞生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并非“属人”的技术,而是被赋予了拜物教性质——私有制所内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抗性关系,被转移并固化于技术之中,显现为技术似乎与生俱来的“客观”属性。在此逻辑下,资本增殖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人仅被视为被动的、可被操控的环节;技术则异化为一种“促逼”力量,不断要求人适应其节奏。人若接受技术绝对理性、无可置疑的拜物教观念,便已成为韩炳哲所言的“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表面自由,实则幻想中自我施加暴力,将生活异化的根源误归于自身,而非背后的资本逻辑。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算法与数据的统治同样使人逐步丧失生活主导权,沦为资本再生产中的客体。人越将技术引发的危机归咎于技术本身的“客观性”,就越深陷智能拜物教陷阱,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瓦解主体意义,最终埋葬人之为人的价值维度。

3 重建人类主体性的路径探析

综上所述,数字资本主义之所以会造成主体性的缺失,归根到底仍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只进行局部调整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应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的深刻反思与变革。

这不仅要求和技术层面进行革新,算法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超越工具理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技术赋权维护人的主体地位而非加剧异化现象;同时培养抗算法驯化的批判性思维,通过伦理案例和偏见识别训练,捍卫人类系统性思考和认知主权。更需在制度层面实施根本性变革,逐步探索并构建以共享、合作、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实现技术发展真正为人服务。使个体能在信息洪流中保持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促进人类主体性的回归与升华。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在中国生根发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马克思

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具体落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近些年来“东升西降、东治西乱”的实际状况也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西方现代化的巨大优越性,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发展为人服务,才能解放人的主体性维度,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2] 赵龙. 主体性危机与对策: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何以自处[J]. 理论导刊, 2023, (05): 88-95.
- [3] 蓝江. 从智能拜物教到算法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05)
- [4] 李戈, 何玉芳.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消解[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03): 101-110.
- [5] 苏慧丽, 张敬威. 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 智能时代教育的主体性危机与破解[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4, 36(01): 12-20+28.
- [6] 王明霞, 殷开达.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主体性危机与应对策略[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2024, 36(04): 334-341.
- [7] 栾青. 审视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基于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视阈[J]. 道德与文明, 2025, (01): 157-167.
- [8] 伍永花. 智能传播时代的主体性危机与复归路径研究[J]. 现代交际, 2024, (04): 72-80+123.
- [9] 徐逸菡. 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研究[D].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3.
- [10]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作者简介: 郝志建(2001—), 男, 汉族, 河北省邯郸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